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一八）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七九期 ——
（二〇〇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 k 0 2 0 1 c）

【大胆假设】苏联导弹击落林彪座机	王年一·吴润生
【小心求证】质疑林彪出走事件——为“九一三”事件三十周年而作	陈晓宁
【史海钩沉】澳洲记者澄清林彪之死真相	孙一先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cnd-cm@cnd.org. 请在 s u b j e c t 中标明 C R 字样。

【大胆假设】

苏联导弹击落林彪座机

• 王年一·吴润生 •

“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三十多年来，国内外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这一事件真相的探讨和研究。本文综合各种已经公开发表的材料，着重对林彪座机坠毁的原因，发表一家之言。

不久前，我国第一次在正式出版的期刊上公布了“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标明林彪座机在坠毁之前的最后航线是：先向西飞，然后沿着我国的边境线向北飞，飞到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后，又折回向南飞，往我国边境飞来，在返回途中坠毁于温都尔汗。（见《中华儿女》杂志 2 0 0 1 年 2 月号）

这一“航线图”虽然在我国是第一次正式的公开披露，但在国外和我国私下里早已流传。解释其原因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兵不厌诈”说。认为林彪座机兜圈子是为了迷惑我边防部队，顺利逃避被我击落的危险，达到成功出逃的目的。我国的官方人士基本持此说。

二是“驾驶员潘景寅反抗”说。此次林彪专机机组成员康庭粹在《中华儿女》杂志上披露“航线图”时即坚持此说。

三是“林彪命令返回”说。国内外大多数文革史研究专家都认为林彪只同意出逃广州，并未打算叛逃苏联，是林彪觉察到飞机出境后命令飞机返回的。但此说法不被官方认可。证据是林彪的贴身警卫李文普事件后揭发，在林彪开往山海关机场的座车上，听见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是惟一的一人一言的“孤证”，已经有人专门撰文分析这个“孤证”的可信度，本文不作深究，承认此为一说。

本文对以上三种说法不作是非评判，只探讨林彪座机最后坠毁的原因。

我国官方至今仍坚持认为，林彪座机不是“坠毁”，而是迫降时爆炸。迫降的原因是燃油不够和没有领航员。

当年我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承认飞机残骸上有一个大洞，但认为此洞不是导弹所击中，而是飞机在地面爆炸时造成的。许大使的推断不过是为表白：我国没有发射导弹击落林彪座机。因为伟大领袖毛泽东说过：“天要落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毛泽东不让打，谁敢打呢？

但有一个事实难以隐瞒，即林彪座机着陆之前已经起火。王兆军在《谁杀了林彪》（台湾世界书局出版）一书中披露，温都尔汗莹石矿的一个工人亲眼目睹“飞机降落时尾巴着火，坠地地点离他只有九英里，他看见了全过程。”日本《每日新闻》记者在蒙古温都尔汗采访时，遇到了当年的目击者，证实林彪座机是先着火后坠落。如果认为国外的报导不可信，我国《人民日报》主办的《环球时报》1997年11月23日头版发表的“本报驻蒙古特派记者敖其尔”的文章中也无意中披露：“最早发现飞机坠毁的拉哈玛大娘，住在离飞机坠毁地点仅三公里远。……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拉哈玛大娘看见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绕图门山转一圈后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大概不到法20分钟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这无意间的披露告诉我们：林彪座机不仅在着陆前已经着火，且着火后还飞行了大约20分钟。我国的权威报纸、我国的著名记者，披露的信息应该比较真实可信吧？

从飞机残骸上留下的大洞和目击者看到的飞机着陆前二十分钟已起火的事实，基本可以否定“飞机迫降时爆炸起火”的结论，应是遭攻击后爆炸坠毁。

既然我国没有打，会不会是别国打的呢？本文列举如下四条事实供诸君推断——

第一、三十多年来，尚没有一点证据说叶群和林立果在出逃之前已经和苏联取得了联系，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苏联对林彪的“叛逃”一点不知情。这是无可置疑的。

第二、苏联人如何看待林彪座机的航线？若说苏联军队对林彪座机这不速之客到访毫无觉察，那是自欺欺人。前蒙古外交部次长永栋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说：“当时的说法好像是蒙古完全不知情，其实是一开始便掌握了该机的飞行轨迹。”蒙古都掌握了林彪座机的飞行轨迹，苏联会不掌握吗？中、苏、蒙三国边境交界处没有民用航线，林彪座机只会被认定为借用民航飞机执行军事任务。进入苏、蒙国境之后又迅速返回，只能认为是侦察任务完成或发觉被跟踪。若是友好邻邦，应在事发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然而，当时的中苏关系都是视对方为“头号敌人”。苏联面对这一突发事件会采取什么果断措施，应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勃列日涅夫的话中之意。当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国就披露了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闻讯后发出了三声“可惜”的事实，不过，我国却认定他是因没有得到“大汉奸”而惋惜。现在从各种渠道证明，勃列日涅夫的“可惜”之言完全属实。但话中之意并不一定是当年中国政府判断的那样。曾两次去调查林彪座机坠毁事件的克格勃成员向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记者提供：“我们花费了一年时间，才查清楚林彪死亡的原因，但我们既不能告诉中国人，也不能告诉蒙古人。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一真相：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亚历山德鲁和我”。该讲话认定我国政府不知林彪死亡真相，可反证中国没有击落座机。但这很可能是苏军的“误打”，因完全不知情而导致“失误”，失去了林彪这颗攻击中共的重磅政治炸弹，勃列日涅夫无奈地发出了惋惜之声。而这并没有违背“可惜”这个词的本意。

第四、苏军肯定有“击落一切入侵者”的“条令”。如此断言决非凭空捏造。对于“敌国”的任何飞行器，只要进入苏联领空，都要击毁。哪怕是真正的民航飞机，他们也视为伪装，视为“军事侵略”，攻击起来不会有丝毫的迟疑。80年代击落韩国偏离航线的真正的民航机就足以证明。若不是韩国提出强烈抗议，若不是美国窃听到苏联军机上的对话，苏联绝对不可能承认这架民航机是被他们的导弹击落的。前苏军的一部份、现乌克兰部队，最近甚至将并未偏离航线并没有进入乌克兰领空的俄罗斯民航机击碎。若不是在飞机残骸上搜集到弹片，乌克兰政府仍然死不认帐！

判断苏联导弹击落林彪座机，笔者最近得到一条最重要的旁证：2001年第11期《党史天地》刊载鲁青的文章披露，1971年9月14日，即“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蒙古外交部约见我驻蒙大使许文益时，就一口咬定此飞机是“军用飞机”，且“侵犯了蒙古领空”。9月16日在温都尔汗“验尸”之后，中蒙双方外交谈判时，蒙方不仅坚持是“军用飞机”，还坚持“机上人员全部是军事人员”。中方坚持是“民航飞机”，“机上有军事人员，也有非军事人员”，蒙方坚决不予认同，致使谈判破裂。蒙古外交部的坚持己见，显然是为他们的导弹击落飞机赢得坚实的理由。果然，从这时候开始，蒙古国内，到处流传着“中国军用飞机入侵蒙古，被导弹击落”的新闻。9月30日，蒙古全国报纸和广播电台以新闻消息的形式，公开对国内外报导了民众中流传的内容，而中方对此却“采取了沉默的态度”。为什么蒙方主动承认了我军用飞机被他们的导弹击落（尽管不是官方正式声明，而是新闻报导），中方却因何不予追究，反而保持沉默呢？直到30年后的今天，中国也没有就此事向前苏联和蒙古“讨个说法”呢？

依笔者之见，中国确有难言的苦衷和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大致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若提出林彪座机被苏联击落的疑问，必给预先确定的“叛国”性质横生枝节，无法解释林彪既然叛逃苏联因何又被苏联导弹击落？从大逻辑上很难讲通，更难以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口服心服地接受“林彪叛国”的结论。而当时，“粉碎第二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林彪反党集团”是我国的头等大事，和苏联的关系已退居其次。一切服从大局，一切服从主要矛盾，不抗议不质疑是我国政府的必然选择。

第二、毛泽东时代，我国政府视苏联为国际上的头号敌人，视林彪为国内的头号敌人。不必讳言，那时不见得所有的军事专家都对林彪座机“迫降爆炸”说绝对相信，肯定会有人存有对苏联导弹击落的疑问。只是，既然认定苏联是敌人，林彪也是敌人。敌人之间互相残杀不是绝对有利于我方吗？我们乐得坐山观虎斗，欣赏“狗咬狗”啊！有什么质疑、抗议之必要呢？

第三、若隐瞒林彪事件的真相，就事论事，以苏军击落我民航机为由提出抗议，理由很不充份。那里本来没有民用航线，飞机又闯入人家的领空，特别是最终坠落在人家的领土上，摔死的人员只有那么几个，庞大的三叉戟飞机上只载了几个旅客，无论如何不符合情理。因为自己“理短”，不如乾脆默认。

第四、我国政府所以至今不要求俄罗斯将尘封30年的那一段历史档案解密，这中间恐怕有一个逻辑上的误区，认为若俄罗斯承认当年林彪座机是苏联导弹击落，便要将林彪事件的“叛国”性质彻底翻案了。诚然，若修正了林彪座机系“迫降爆炸”的一贯定论，首先得承认座机向北飞入苏联境内之后又折回向南飞的真实航线，但这也只能说明座机上“有情况”。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是否一定是林彪命令回国，还是驾驶员英勇“反劫机”？苏联击落林彪座机的事实，并不能为某一结论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更不能和林彪事件的翻案等同起来。

所以，中国人民有权要求俄罗斯把林彪座机坠毁的历史档案尽快解密，将只有勃列日涅夫等四个人知道的林彪死亡真相告白于天下。因为历史总归是历史，要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每一个在历史长河中生活的普通人的基本权利。我们不甘心被历史的造假者、伪装者、扭曲者、隐瞒者永远蒙蔽！请还我芸芸众生对历史真相的知情权！时代已进入了新世纪，这人权中起码的要求应该不难实现！我们期待着！

□ 寄自中国

~~~~~

【小心求证】

质疑林彪出走事件  
——为“九一三”事件三十周年而作

• 陈晓宁 •

2001年的9月13日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林彪913事件三十周年，笔者经过长期严肃的分析后认为本案存在多处重大疑点。所以特作此文。笔者将本着严肃、认真、研究的态度对913事件进行全新的探讨。

内容提要：在本文中笔者将要对 9 1 3 事件提出以下新的核心结论：

一、林彪在 1 9 7 1 年 9 月 1 2 日夜出走去机场的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关键性的话。这是林彪事件关键性证人李文普说的谎话，做的伪证。

二、林彪在 9 月 1 2 日夜乘机要出走的目的地是广州（香港），而不是想叛逃苏联。最终没有去往广州的原因是 2 5 6 飞机燃油不足。而后来飞向蒙古、苏联的行为应由林彪之子林立果负责。

三、2 5 6 飞机在外蒙古境内没有一直飞向苏联，而是在飞到苏联、蒙古边境处调头，向中国方向返回。这个举动不是因为燃油不够导致想找机场迫降，而是因为林彪不想叛国，所以强令 2 5 6 飞机返回中国。

四、2 5 6 飞机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着陆前，在空中就已经发生爆炸并起火。

五、2 5 6 飞机在空中爆炸起火是由于在温都尔汗附近被驻蒙古的苏军导弹击中所致，飞机在受伤后，进行带火迫降时又发生事故，最后迫降失败，机毁人亡。

进入 2 0 0 1 年后笔者见到了两份最新出版的林彪事件亲历者的回忆书刊。一份是我国当年驻蒙古的武官孙一先写的《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中国青年出版社，2 0 0 1）。

另一份是 2 0 0 1 年 2 月号的《中华儿女》杂志上刊登的林彪专机机组成员康庭梓的文章《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后》。

康庭梓的文章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新信息，其中最最引人注目的是杂志 P 4 1 上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在外蒙古的一段航线中清楚地标注出：飞机在飞到接近苏联与蒙古的边界线后，却突然掉头向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并在返回途中坠毁于温都尔汗。

“256 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之前是向着返回中国的方向飞行的。而不是向苏联方向飞去”。笔者第一次见到这种说法是看王兆军的书《谁杀了林彪》（台湾世界书局 1 9 9 7）。王兆军在书中是这样叙述的：

……林彪和他的妻子都死在飞机上，三叉戟坠毁的时候，不是在寻求庇护的路上，而是正向中国方向飞行。林的妻、子可能强迫林改变意志逃窜苏联。……苏联官员的证词说：“飞机先向西飞，后来改向北飞。在飞到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折回来向南飞”。彼得（指 Peter hannam——笔者注）采访了两次去调查林彪之死的克格勃小组。该小组一成员（指托米林——笔者注）说：“我们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才查清楚林彪死亡的情况，但我们既不能告诉中国人，也不能告诉蒙古人。只有四个人知道林彪死亡的真相：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亚历山德鲁和我。”  
……

必须说明的是，王兆军书中的这段叙述是引自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资助的记者彼得·汉纳姆（peter hannam）的报导。这位记者于 1 9 9 3 年亲自跑到

苏联和蒙古采访，采访了大量当事人（包括克格勃人员），其中经过他们的采访，由克格勃人员提供的林彪确实死于蒙古的结论，已经成为一项来自第三方的铁证。彻底打破了诸如“林彪死于国内”的传说。我国已公认汉纳姆的采访报导具有很高的可信性。

其中，“飞机先向西飞，后来改向北飞。在飞到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折回来向南飞”，这一说法来自苏联官员，苏联人当年通过雷达是很容易监视256飞机的航线的。这一结论是很容易核查、对证的，所以汉纳姆在这一点上的报导应是可信的。最近笔者又看到一则报导，是日本每日新闻系周刊《S u n d a y每日》于2000年独家专访前蒙古外交部次长云登的报导。云登谈到：“……林彪的飞机似乎为了闪躲雷达，因此一直是低空飞行地进入蒙古境内，当时的说法好像是蒙古完全不知情，其实是一开始便掌握了该机的飞行轨迹，因为该机在极低的低空飞行，因此轰隆声响，蒙古系循声而追踪的”。可见，蒙古当时都能掌握该机航线，以苏联的军事技术水平跟踪一架民航飞机就更行了。

笔者在当初从王兆军的书中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时感到无比吃惊。因为我们以前听到的913事件的正式的说法中从来就没有这一条。我们一般人接受的信息是：林彪是有意叛逃苏联的，他的座机一直向着苏联飞去——即使不是笔直，大方向也是朝着苏联。在直飞到温都尔汗附近时，由于燃料不足坠毁（这种看法应该是一般老百姓得到的通常信息，在孙一先的书中，也反映了这种大众观点。在2001年刚刚出版的孙书P263中，孙一先也给出了一幅林彪飞机的航线图，在这幅图中，就标注出256飞机在外蒙古境内是一直飞向温都尔汗的——没有从苏蒙边境返回的信息。看来这位当年的驻蒙武官，亲自向周恩来汇报林彪坠机情况的“知情人”至今还是与大多数人一样，认为256飞机是直飞温都尔汗坠毁的，不存在回返一事）。谁听说过它到了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却不再跨前一步，而是向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并在返航途中坠毁于温都尔汗？

不过对于王兆军书中提供的这些海外消息，笔者当初持存疑态度，只看为一家之言（按说王书引用的材料是苏联克格勃的调查，应该有极大的可信性），仅听一方的说辞难免有偏颇。但是，现在我们看一看康庭梓文章中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再想一想这篇文章并不是发表在一般的猎奇小报上，而是刊登在非常严肃的，由团中央主办的，声称“不允许有任何虚构”的《中华儿女》杂志上——它的一些文章的发表甚至专门经过中宣部审查。我们还会认为“256飞机在飞到苏联、蒙古边境处调头，向中国方向返回”一事是无端的谣言吗？

为什么我方书刊几乎一概不提256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一事？笔者认为恐怕并不是我方故意隐瞒此事，而是我方当初根本不了解这一情况，因为我方雷达无法监测这一现象，从而做出了错误判断。我来简单分析一下：我方出版的书籍几乎很少介绍256飞机在外蒙古境内的详细飞行轨迹和飞临各处的详细时间。笔者见到的最详细的叙述是当时任军委空军指挥所值班作战参谋的朱秉秀的叙述（见周敬青的文章《是周恩来不让外逃的林彪返回着陆？》，发表在《党的文献》杂志1999年第4期）：

……眼看目标靠近边界线移动，1：50飞出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并在逐渐下降高度，直到我地面雷达上的信号于温都尔汗以南消失。李德生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雷达信号最后消失的位置。……

请大家注意一下上述引文中的一个细节，即：雷达信号消失于温都尔汗“以南”而256飞机实际上却是坠毁于温都尔汗“东北”（不是“以南”）60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孙一先书P278，263）。既然消失于温都尔汗“以南”，而实际坠毁于其“东北”。也就是说在256飞机在我方雷达上消失以后，并不代表它坠毁了，256飞机实际仍在飞行。

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256飞机于温都尔汗以南，从我方地面雷达上消失并不是由于它坠毁了，而是由于它飞出了我方雷达的监测范围。这以后它虽然还在飞，但其后来的举动我方实际已经无法通过雷达监视了。

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温都尔汗附近离中蒙边界240公里以上，加上256飞机在外蒙境内“在极低的低空飞行”，这都可能造成飞机脱离我方雷达监视范围。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在康庭梓文中就提到：他自己在山海关机场调度室通过雷达仅监视了256飞机14分钟，距离120公里，256飞机就从山海关雷达屏消失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则当然后来256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一事我方就真的无法监视，因而不了解。反而想当然地错误认为：256飞机从我方雷达消失就意味着它坠毁了；或者是错误地认为：飞机从雷达上消失后直飞温都尔汗附近坠毁。

正由于苏联方面的雷达可以全程监视256飞机的行踪，所以笔者认为苏联人得出的“256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的结论要比我方结论可信得多。而康庭梓给出的令人惊讶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恐怕是他们今天也看到了外方相关报导，并赞同了苏联人的说法吧！

以上的叙述无非告诉大家一个我们过去从未听说的结论——“256飞机在外蒙古境内不是一直飞向苏联，而是在苏联，蒙古边界掉头向中国方向飞来”。这样就自然引发一个问题：既然早想叛逃，为何往回飞？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为什么？

256飞机从苏蒙边境的掉头回飞是不是仅仅因为飞机燃油不够，所以只是想回头找机场迫降？若是这样的话就跟现在的通常说法只有小细节的差别，而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

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分两种情况讨论一下：

第一种情况：256飞机机组成员技术过硬（虽然未带领航员等人），在飞机飞到苏蒙边界附近，发现燃油不够时，仍然能够大致知道自己所处位置。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他们就知道此时已在苏蒙边界附近，则他们一口气飞过边界到苏联机场降落岂不更好？苏联的机场应该比蒙古机场多很多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256飞机调转回返找机场迫降是不合理的。

第二种情况（也是最可能的情况）：由于256飞机起飞时未带领航员等人，所以飞机飞临苏蒙边界时，机组人员搞不清自己精确位置。如果是这种情况，当机组人员发现燃油不够时，他们将面临“是向前飞找机场迫降，还是回头飞找机场”

的选择。笔者认为，当256飞机对准苏联方向飞行后，通过飞行时间和飞行速度，驾驶员还是能大致判断出此时离苏联不会太远了。一口气向前飞，在发达的苏联境内找到机场的可能性当然大于往回返在落后的蒙古境内找到机场的几率。再说，就算驾驶员一点也不了解自己的位置，则往前飞找机场和往后飞找机场的难度不是一样吗？而往前飞还免去了费劲掉转机头的麻烦——何必要转头呢？最要命的是：往回飞找机场，在不知自己确切位置的情况下，他们就不怕一不小心飞回中国？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搞不清自己精确位置的前提下，如果256飞机转头是为了找机场，则因为它需要边飞边寻觅，它的航迹就应该是曲折的，徘徊的，犹豫的。虽然从康庭梓文中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中，由于该图比例尺太高，不太精细，我们现在还不易判断它是否是在曲折地寻觅。但是我们可以从苏蒙方面对256飞机采取的举动看出一些端倪：

在汉纳姆的采访中，苏联官员也认为：“三叉戟坠毁的时候，不是在寻求庇护的路上，而是正向中国方向飞行”。从这段字面可以看出：苏方并不认为256飞机是想找机场迫降，而是向中国方向飞。而在后面的详细分析中我们将看到恐怕正是由于苏蒙方面也做出了判断认为：256飞机转头是为了返回中国，而不是为了寻找机场迫降，所以才将它击落。（详见后面的论述）

从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大致否定“256飞机从苏蒙边境掉头回飞是因为缺油而想找机场迫降”的观点。

既然256飞机的掉头回飞不是因为缺油而想找机场迫降，那么，它从苏联、蒙古边界掉头向中国方向飞回来这是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为什么？

要想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整个事件前因后果有个交待。在此笔者通过自己长期的资料积累和思索，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全面谈谈自己对1971年9月13日这一天事态的看法。对有兴趣的读者，相信不会浪费你们的时间，还是值得大家一看的：

## 一、林彪出逃是什么性质？

其实，林彪出逃是应该分成两种情况来分别讨论的。因为他们的恶劣程度是完全不同的。第一种是出逃广州（香港），第二种是出逃苏联。

如果林彪真的出逃广州（香港）的话，属于党内矛盾。可以说从千百年的历史角度说，林彪顶多是当时的党的叛徒，却不是民族的、中国的叛徒。对林彪在中国的历史评价没多少影响。这就象历史上的各派党争一样。不论属于哪一派别，只要他不出卖民族利益，他就不是汉奸卖国贼。

如果林彪真的出逃苏联的话，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当时中苏关系严重对立，中苏间矛盾就是民族矛盾、国家矛盾。这个时候出逃（叛逃）苏联，那么不管什么原因，叛逃者都将是背叛民族、背叛祖国。他都是汉奸、卖国贼、民族的罪人。如果林彪走上了这条道路，那么，不管他过去有多大功勋，他都将和历史上的大汉奸张邦昌、秦桧、汪精卫一个性质（顶多是程度的不同



，没有本质的区别）。他将被同样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真是一万年也翻不了身。

二、林彪有没有叛逃苏联，当汉奸、卖国贼的动机与思想基础？

笔者的分析是肯定的：没有！至少是非常不充份！

一个人的行为是受他的思想支配的，我们先来看看林彪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样的。

以下摘自林彪着《战术思想研究——论一点两面及战术作风》：

林彪说：“……我们是人民起义军，……，是为了广大人民的解放，而不是为了自己或哪一个。不是为了吃粮。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会影响到人民的吃饭、住房、种地。我们每一个胜利都与人民利益直接联系着。我们自己吃得坏些，穿得坏些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生命，只是沧海一粟。无数万人的生命，他们后代的生命，才是宝贵的。……”

林彪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战争年代的林彪无愧于他说的这些话。林彪平时不讲吃，不讲穿。想的就是部队，就是打胜仗。就是为穷苦人民能过好生活打江山。

上级发什么衣服他就穿什么衣服，从不计较长短尺寸、合不合身、款式美不美观、穿在身上潇潇洒洒。周赤萍回忆林彪总是穿一套灰布军衣。1958年他在昆明看到林彪时穿的是很普通的黑色呢子衣服。袖口上还打了补丁。

林彪吃得很简单，两菜一汤，青菜，豆腐，平时唯一的零食是炒黄豆。有一次在法库，林彪到地主家吃饭，桌上有个酸菜炒白肉，他吃了几口。从来没有讨论过吃喝的林彪，回来后不同寻常地连连说好吃，好吃！说过了又说再不能吃了。好吃的东西林彪为什么再也不吃了？为了减肥？不是！是为了怕吃了地主的饭，就不再想为劳动人民打江山了。这可是立场问题。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出林彪并不是不爱吃美食，而是有高尚的理想，并且对自己要求严格。战争年代，他工作起居都是简陋的农舍里。他经常深入火线上，打起仗来一夜一夜不睡觉是家常便饭。（参见韦力编《1965年前的林彪》西藏人民出版社P229）

林彪家的保姆王淑媛在913后“揭发”林彪“艰苦朴素，别看他外表穿得好，里面的衣服都是林立果穿剩下的，他补补再穿”。王老太太还揭发林彪“从来不玩女人！不像那些人喜欢玩女人。”。林彪不玩女人是他从来没这欲望，还是他玩不动？都不是！林彪的前妻张梅号称陕北一枝花，叶群也是延安八美。看来林彪不是没有好美之心。解放后有一次叶群参加一个老干部的婚礼，那老干部娶的是年轻貌美的文工团员。林彪为此训斥叶群道：“老配少，参加这种婚礼干啥？什么思想作风？我不去是我看不惯，你去你是什么思想作风？”从寻常的夫妻吵架可以看出：林彪并不是没色心，没色劲。而是对自己有高尚的道德要求。看不惯声色小人。

我们从林彪长期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的道德是高尚的，他的言行是一致的。

林彪这样一个道德基础的人，那么聪明，睿智的人，一个对自己有严格要求的人，怎么会分不清好坏，不顾大节，以自己老残的身躯，还贪那么一点苟活，去做遗臭万年的民族败类呢？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有人可能会指责林彪在文革中的言行。我们应该承认他在文革中有所投机（有一部份可能出于无奈），他当然应该为此担负他应负的责任。但是林彪在文革中主动攻击的少（这是和江青集团的巨大差别），在大形势下跟进的多。但也有很多事明明不是他干的，也被推到林彪身上，这从林彪秘书张云生的书《毛家湾纪实》中可以大量看到。

在这里笔者认为：林彪没有叛逃苏联，当汉奸，卖国贼的充份动机与思想基础。

三、林彪在直到9月12日晚的心态都表现出他拒绝叛逃苏联：

以下选自1994年8月10日《中华读书报》的图门的文章（图们是中央军委法制局第一任局长，林彪专案办公室负责人之一，特别法庭公诉人）：

9月2日下午……

林彪说：“北戴河的房子不要盖了，反正我活不了几天了。”……

9月11日12：30，内勤听到……林彪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

——转引自《风云913》，张聂尔，解放军出版社P311—312

从以上看出，到9月11日时，林彪有的是“从容就义”的心。连去广州的心都没有，更别说叛逃苏联。

以下选自林立果未婚妻张宁写的《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P243—244：

（9月12日晚）十一点多了……

不一会儿，小陈（指林彪内勤陈占照——笔者注）端着茶盘从林彪那边走廊上的小侧门里冒出来，急步走向林立衡：“我悄悄进去，刚走到沙发后面就被林立果发现了，凶巴巴地推我出来，差点把我推倒，吓坏我了。”立衡和众人急问：“听到什么呀？”小陈说：“我刚进去的时候，听到首长哭（呜咽）着说‘我至死是民族主义者’，听到这句，就被立果发现我了，立果推我的时候，首长回头望了一眼，我看见首长正淌着眼泪。”

……

由于林彪出走是在9月12日晚11：40左右，而这一段叙述距离林彪上汽车出走只有几十分钟了，对了解林彪出走前的最后心态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有必

要先辨析一下它的可靠性：

首先，陈占照本人没有任何理由骗人。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倒是有可能编造有利于翻案的说辞。但是从上文可以看出：听陈占照叙述的不止有林立衡，还有“众人”，应该不难找到陈占照及其他人对证。另一方面，林彪最后几天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会倍受林彪专案组的关注。这句话应该有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所以可以查阅当年的揭发材料。由于证人众多，所以林立衡敢于在此说谎的可能性极小。此段材料应该可信。

那么林彪为什么要说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呢？或者是林彪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既然提到所谓“民族主义者”，那一定是涉及了外族，此处肯定指苏联。在这种时刻，林立果在与林彪的谈话中谈到苏联，那只可能是与林彪讨论逃往苏联的一种选择（当然也会讨论去广州的选择）。而林彪又为何流泪呢？很简单，逃往苏联就是出卖民族，当卖国贼，想来林彪一世辉煌，而现实却真要逼着他往这条可耻的路上走。临老临老却要面对这样尴尬的选择，他怎能不感慨伤怀呢？而林彪说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就表明了他要坚守民族气节，不愿意叛逃苏联的态度——真想背叛自己民族的人，还谈什么“民族主义者”？而出逃广州（香港）林彪应该是同意的。

所以，林彪出走之前几十分钟时，他仍然不同意叛逃苏联（但跑到广州是同意的）。

总之，在与毛主席的关系已不可挽回之后，林彪有“坐牢”的心；有“从容就义”的心；也有南走广州（香港）的心。但是不同意叛逃苏联（叛逃苏联作为一种选择，林立果同林彪讨论过，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被林彪拒绝了）。

四、林彪的行动也表现出他要去的是广州（香港），而决非苏联：

我们请看 8 3 4 1 部队大队长姜作寿发表在《中华儿女》上的访谈录：

回到大队值班室不大功夫，刘吉纯副科长带着林立衡来找我，说有要紧事情。……“叶群、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他们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你看怎么办？”林立衡急切地问。“你说的这些可靠吗？”我惊异地问。“可靠。这是叶群当面给我布置的，她让我马上回楼准备，让我跟他们一起走……我不能跟他们一起走呀。你看我该怎么办？”在夜暗中，我仍然能感觉到她那真诚期待的目光。她所讲的，使人不能相信。象林彪这样的党的高级领导人，怎么可能跟老婆孩子去香港呢？

这个细节（转引自张聂尔书 P 3 1 5）发生在 9 月 1 2 日晚 9：20 左右，而林彪踏上出走的汽车是在 9 月 1 2 日晚 11：40 左右。也就是说：在林彪出走前 2 小时的时候，叶群、林立果对林立衡交待的仍是逃往广州（根本不是苏联！）。

再请看张聂尔书 P 3 1 3：

大约（9月12日）晚上10时，林、叶和林立果又进行密谈。密谈中，林办工作人员听到林立果好像对林彪说：“黄吴李邱……你都交给我了嘛！到了香港就好办了。”

这是引自图门的文章。这一段话是工作人员听到的“密谈”，既然是“密谈”就不会是掩人耳目的假话，它真实反映了林立果当时的打算——是要去香港。而晚上10点——这已经离林彪出走只有1个多小时了。

正如张聂尔分析的“……至少在9月12日晚10时左右，林彪还是准备去南方……更能证明林彪原来去广州的打算”。（还有许多细节分析，请参见《风云913》P314，张聂尔，解放军出版社）。

总之，林彪在9月12日晚11：40左右踏上出走的汽车的时刻，他的目标是去广州（香港），而决非苏联。

五、到底是什么证据证明林彪是主动逃往苏联呢（请注意“主动”两字及含义）？

笔者不否认林彪想主动出走广州（香港），而前面笔者提过，这“南逃广州”和“叛逃苏联”性质可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前者是党内矛盾，后者可是出卖民族和祖国。那么究竟是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林彪是想主动叛逃苏联从而遗臭万年呢？

找来找去笔者惊讶地发现：只有唯一的一个证据！就是林彪说的一句话（即“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精确地说是由林彪警卫参谋李文普口中得知的这一句话。

我们不禁要问：这么大个林彪事件凭什么仅靠李文普的一句证词——这是孤证嘛！难道就没有什么更多的证据？令人惊讶的是：没有！就是没有！所有论定“林彪是主动逃往苏联”的权威证据唯一就靠李文普这句话。

我们先看党史专家，中央党校教授于南在《说不尽的毛泽东》中的说法：

在审理两案时，曾就林彪是否被劫持作过调查。结果证明被劫持的说法站不住脚。这里的关键人物是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他在车上听到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转引自张聂尔书P310）

——笔者注：这里李文普的话被认为是“关键”。

我们再看林彪事件研究专家肖思科（上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后勤学院政治处主任，调查研究“两案”10年，出书5本：《超级审判》、《林彪元帅叛逃最新报告》……）的说法：

针对“绑架出逃之说”，肖思科找到林彪事件的关键人物，在林彪身边做警卫和生活服务工作的总参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李文普。

笔者注：“关键”还是李文普。

我们再看林立果未婚妻张宁写的《自己写自己》P 295（作家出版社）：…  
…换取李处长石破天惊的一句话：“林彪是自己走的，他说‘到伊尔库茨克’。”  
…… 鉴于李处长的特殊身份，他讲的证据，便成了林彪叛逃的权威铁证。

笔者注：李文普的话成了“权威”、“铁证”。

读者诸君不用再看了，再看还是李文普。我们可以说李文普这句话要了林彪的命。真能让林彪一万年也翻不了身。但是由于这是一个人的“孤证”，听到这句话的其他人全死光了。所以，现在全靠李文普一个人的一张嘴，连个旁证都没有。李文普说什么就可以是什么。那么，是不是也给作伪证提供了条件呢？

六、笔者经过份析后得出判断：林彪在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话。李文普的揭发很可能是迫于某种政治压力说的假话、作的伪证。我将在下面作出分析。

让我们先看一看李文普发表在《中华儿女》杂志1999年2月号上的文章《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对这一段情况的叙述（这与肖思科所作的采访大同小异）：

我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上来，林彪第一个走进，叶群第二个，坐在林彪旁边，第三个是林立果，第四个是刘沛丰，我最后上车（简录）。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车开动了。叶群对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车到56楼时，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58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

叶群说：“8341部队对首长不忠，冲！”杨振刚加快速度，过了58楼。

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要到苏联去。当时一听去苏联的地方，脑子里第一个反映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

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我转身朝58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听到三辆车通过……后来，是8341部队二大队的卢医生给我包扎的。……子弹穿透手臂，造成粉碎性骨折。医生问我怎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父子如何如何，因为这是重大机密，我们做这项工作不用谁教都知道的。所以，只好说是自己“枪走火”。

对这一段材料笔者提出几点疑问：

第一点疑问：如果林彪在车上就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李文普和司机杨振刚：“我要当叛徒，我要叛逃苏联？”，林彪是

不是有神经病啊？他就不怕李文普和杨振刚拔枪反抗？或到机场后，趁机场人多反抗或逃走？林彪一点都不怕叛逃苏联的举动在上飞机前就暴露？有哪个劫机犯会傻到在上飞机之前就宣布“我要劫机”？最合理的方式是先把李、杨骗上飞机，再用枪逼着他们服从。比如：同一事件中的周宇驰，李伟信、于新野就给出了好例子。他们骗直升飞机驾驶员陈修文时，也是告诉他去北戴河汇报，等上了飞机，再拔枪威逼去蒙古。哪有一上来就告诉陈修文去苏联的？林彪会如此不谨慎和弱智？李文普此说不合逻辑。

第二点疑问：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见到这句话，笔者的问题就来了：林彪指挥对苏战备那么多年，他会不知道离中苏边界不算远的著名大城市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后来的苏联远东战区总司令部就设在伊尔库茨克，可见此城的重要意义）？如果连苏联南西伯利亚靠近中国的这么重要的大城市都不了解，那么，从伊尔库茨克飞来的苏军导弹、飞机要多长时间到北京？有多长的预警时间？林彪就都无法判断，那么林彪还搞个什么战备！这明显不符合林彪的作风。林彪当年教杨成武当师长时就告诉他要把地图看熟，最后达到背熟，地图要印在脑子里，做到不看地图也能指挥作战。地理、地图是林彪的强项啊！当年林彪经常比第一线指挥员还熟悉地形。怎么一遇到李文普，林彪作风都变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别只是空头推理。来个有说服力的实际例子让大家看一下。

以下选自林彪秘书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P 319（春秋出版社）：

林彪煞有介事地发出了“第一号战斗命令”，他本人当时也大概是确估10月20日那天会发生苏联对中国的突然袭击。

根据预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率领的代表团从伊尔库茨克（请各位睁大眼看这个地名——笔者注）乘飞机起飞后，定于20日中午抵达北京东郊机场。林彪平时在中午12点前开始午休，但这天他却坚持不等苏联代表团从飞机上走下来，决不睡觉。他判断苏联人坐的飞机，很可能不是运来什么谈判代表，而大半可能是携带原子弹的不速之客。因此，从这架飞机起飞开始（应该是从伊尔库茨克起飞的吧！——笔者注），何时经过蒙古的首都，何时进入我领空，何时经过张家口，何时飞近北京上空，何时在东郊机场降落，何时见到苏联人从飞机上走下来，他都不厌其详的听取从北京及时传来的情况报告。直到最后一次报告，才使他放心地去睡午觉了。

张云生的回忆录一向以准确、真实著称。所以，似乎可以这么说：从伊尔库茨克到北京东郊机场的每分每秒林彪都曾关注过。“多远？多长时间？”，这种问题林彪还用问吗？怎么一遇到李文普，林彪就弱智了——不但故意问他早该知道的傻问题，还故意暴露了叛逃的贼心。

第三点疑问：林彪的司机杨振刚的举动也不太合理。林彪汽车上一共6个人，他们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李文普，司机杨振刚。前4位是林彪“阴谋”的核心人物。而李文普和杨振刚是局外人，特别是杨振刚，可以说基本不了解内幕。过去人们从来没有关注过杨振刚的举动。其实很值得研究一下他。如果林彪问了“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而李文普又大喊“你们究竟要到哪

里去？当叛徒我不去！”，则杨振刚当然应该明白林彪是要叛逃苏联。他应该有什么举动？杨振刚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他一个小破司机又不是死党，犯得着替林彪卖命吗？他应该也象李文普那样逃跑才对呀！即使汽车上怕林立果用枪打他，在下了汽车上飞机这个空当，应该是有机会跑的。受党教育那么多年，组织上层层筛选的人，面对叛国者即使没有抵抗的勇气，跑都不敢吗？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杨振刚反抗，反而从张宁的书中看到正是杨振刚将林彪“扛顶”上飞机的——他不但不反林彪，还帮林彪（张宁书P 2 5 3，关于这一细节，目睹者人数应该不少，应该能避免“孤证”的弊端。张宁的书应该有所依据，应该不会胡说。）。

另外，据李文普自己的文章谈到：“……这一切，山海关机场的许多工作人员都亲眼所见。林彪是跟在叶群身后从飞机舷门的软梯子自己爬上飞机的。如果他不想走，在登机前说一句话，机场上的工作人员、飞机驾驶员和随机工作人员都会上前保护林彪制止飞机起飞……”。从李文普的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机场上的工作人员”就在林彪一行的附近。在山海关机场的许多工作人员众目睽睽之下，杨振刚此时想跑是有机会的嘛。但他并没有想反抗的举动，这合理吗？

而反过来，假设林彪没说过那句要命的话，那么，杨振刚就并不知道林彪要叛逃。在这种情况下，则杨振刚的一切举动就都是合理的，也不会让人觉得反常。

第四点疑问：9 1 3 以后，专案组在毛家湾多次组织林办全体工作人员开集会揭发林彪罪行（即：面对面揭发）。在会上李文普都没有揭发林彪讲过那句话。别的林办人员也没在别的场合听李文普说起。（见张宁书P 2 8 8，2 9 5，由于这个情况当事人众多，所以应当可信。）。

这一情况非常重要。我们不禁要问：林彪如果真说过那句话，则这当然是最重要的证明“林彪主动叛逃”的证据。但李文普为什么在大会上不揭发？他没有可能忘掉这句话。也没必要替林彪隐瞒什么，他只需要实话实说，揭发这句话对他李文普本人没有任何伤害，相反故意隐瞒倒可能给他招灾。但是他为什么当时不当着大家揭发？笔者分析道理很简单：因为林彪根本没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话，所以李文普当时怎能揭发？

只是在后来，专案组对林办人员的交待不满意，将李文普单独关押审讯后，由于某种原因，李文普才揭发林彪说过那句话。

据林立衡和张宁了解的情况：后来，李文普与林办秘书于运深被单独关押审讯。经过专案组多次审讯，李提了3个条件后（1.为李保密；2.保留党籍军籍；3.保证全家老少不受政治歧视），李才交待林彪讲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话。

这当然引发我们猜测是专案组急于找到林彪主动叛逃的证据。但又苦于找不到。于是对李文普进行诱导。李文普原本无材料可揭发，但迫于压力只能“顺杆爬”、作伪证。并趁机向专案组提作伪的条件作交易。大意如此，读者可详看张宁书P 2 9 5。

第五点疑问：李文普会不会撒谎？笔者曾看到林立衡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林晓霖（张梅—刘新明的女儿）的一个说法：“李叔叔是老实人，跟我爸爸十几年，任劳

任怨，忠心耿耿，不会说假话”。真是这样吗？

我们现在就重复摘出前面李文普的文章：

后来是 8 3 4 1 部队卢医生给我包扎的……医生问我怎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父子如何，因为这是重大机密，这是我们做这项工作不用谁教都知道的。所以，只好说自己“枪走火”。

前面刚说“林立果向我开枪”，后面就说“自己枪走火”。好一个老实人，这简直是现炒现卖的说谎。李叔叔这“老实人”，“大老粗”脑子反应真是快，“不用教”都说谎如此及时，如果在一些压力下，说谎不更自然了？而且有更充裕的时间润饰。

以上这些疑问如果仅是单个，孤立出现，我们或许还可以用“偶然性”来解释。但是同时出现还“偶然”吗？李文普作伪证是不是昭然若揭！

请大家注意：李文普是 9 1 3 事件的关键性证人，如果关键性证人在关键性证词上说了谎话，那么对本案将造成什么影响？读者可以自己想象。笔者在这里作一下小结：林彪在出走的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的话。这是李文普被迫作的伪证。林彪有南下广州（香港）的打算，但不同意叛逃苏联（虽然林立果与他讨论过这种情况）。而林立果的计划中首选去广州，去不成就叛逃苏联（这小毛孩子心里是没有多少民族大义的，只要能活，去哪都无所谓——请读者一定将林彪、林立果分开看待。如果想当然地认为父子一定一致，那么林彪事件永远会是一锅粥）。

七、笔者现在可以想象着勾勒一下 9 月 1 2 日夜林彪出走的梗概：

林彪决定去广州（不是叛逃苏联）

一）登上汽车去机场（这里不存在林彪被绑架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去广州是林彪本来就考虑过的一种选择，不需要被强迫。另一方面，如果林彪被绑架，那么上车之前那么多工作人员、警卫战士。他完全可以呼喊和反抗。但他都没做。他的人也是清醒的，这没问题。所以不存在绑架的可能。林立衡总坚持“绑架说”，虽然父女情深，急于替父洗冤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她的说法是错误的。这无助于替父洗冤）

一）林彪在车上并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的话。由于李文普是了解不少政治内情以及林、毛不和内幕的（比如：9 月 1 2 日下午林立衡就对李文普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引自李文普的文章）。所以当看到路上 8 3 4 1 部队拦截林彪座车。他应该已经完全判明了时局，知道自己该站在什么立场上，所以他下车逃走了。（也就是说：李文普的逃走，并不是由于林彪说了那句话引起的，是由于李文普本身精明地判断出了时局造成的）

一）林彪一行上了飞机后，起初目标仍然是广州，然而经过一小段飞行后，由于某种原因发现广州已经去不成了（为什么如此？笔者推测可能是：潘景寅告知林立果：由于没来得及在山海关机场加油，机上的十二吨油飞不到广州）。于是守在驾驶舱里的林立果按照另一套方案命令潘景寅飞向苏联。此时的林彪应该坐在飞机机舱中，对驾驶舱中的这一变故还不知情。



一〉飞机进入蒙古，并一直向苏联飞去。当飞机飞临苏联、蒙古边界时，林彪终于被告知这是在飞向背叛民族与祖国的路上，于是强令飞机返回。于是就出现了那一幕“飞机飞到了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却不再跨前一步，而是扭头向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的怪事。

总之，假如笔者这些分析符合实际的话，则如果说林彪在9月13日这一天的行为犯了什么罪的话，肯定不是“叛国罪”、“汉奸罪”。

以上这几段是笔者对“256飞机从苏联、蒙古边境掉头飞回中国方向”的这一奇怪现象的原因的主观分析，读者诸君自可以有自己的不同分析、观点。

笔者最近还有另外一些重要的新发现，这将引发我们得出判断“可能是苏蒙方面击落了256飞机”：

我方在谈到256飞机在外蒙古境内坠机原因时，现在都是认为256飞机由于燃料不足，又没有领航员等，所以在温都尔汗强行迫降。我方调查组用大量证据说明飞机不是导弹打下的，是着陆过程中发生的事故。比如当年我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在《黄沙作证》一文中就有这样的观点：“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可以肯定，该机不是空中爆炸”。（见《世界知识》1988年1，2期，转引自《林彪家族纪事》P19—21，光明日报出版社）。空军司令员王海当年直接组织了这个调查，他在文章《我的战斗生涯·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中也是此观点。

然而我方似乎没有注意到以下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256飞机在着陆前就发生了爆炸，并已经起火——读者诸君，你们似乎没听说过这个细节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王兆军书中的叙述：

一位在当地莹石矿（指贝尔赫莹石矿——笔者注）上工作的蒙古目击者说：“那天晚上两点半左右，飞机的哀鸣声把他吸引出来。他看见飞机降落时尾巴着火。坠落地点离他只有九英里，他看见了全部过程。”

以上是王兆军书中的介绍。这还是引用汉纳姆的报导。如果有人认为这仅是一家之言，还可能是恶意伪造，不足凭信的话，那么我可以再举出两个我刚刚在不经意间偶然发现的，在我国正式刊物上刊登的重要证据。

以下是本人收藏的《环球时报》（这是人民日报下属的目前很流行的报纸）发表于1997年11月23日第一版的报导《今日温都尔汗》。署名“本报驻蒙古特派记者敖其尔”：

……最早发现飞机坠毁的是拉哈玛大娘，大娘原来住在离飞机坠毁地点近3公里……拉哈玛大娘回忆说，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一阵“嗡嗡”的声音把她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发现这难听的声音是空中传来的。这时牛羊惊散，马嘶狗叫。她仔细一看，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相当低。

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一圈后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20分钟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时没听到大的爆炸声，现场大火连天……

关于这个证据，有一点值得提一下。笔者刚刚看到在孙一先的书P359—360也提到了拉哈玛大娘的回忆。但孙书说：“至于拉哈马大娘说空中飞来冒着大火的飞机，据空军专家分析，她可能把机上耀眼的着陆灯错当成大火”。笔者当然不同意“专家”的高论。

拉哈玛大娘当时就住在离飞机坠毁地点近3公里处，在夜晚2点没有灯光的空旷大草原上，距离短短的3000米难道还分不清着陆灯和大火的区别？况且紧接而来的“现场大火连天”应该很容易对比什么是灯光，什么是火光。飞机在空中盘旋时的火光和坠地后的连天的“大火”难道不是轻易可以对比？拉哈玛当年也就40岁左右，她观察飞机盘旋达20分钟以上，在如此近距离难道还会判断错？

如果这么明显的例子还不能说服我们的“专家”，那么再请看下一个证据，又将如何解释？

这是沈阳军区的李人毅写的《平型关大捷》P580（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

这位商人（指郭经理——笔者注）同时还找到了913事件的目击者——一位仓库保管员。保管员告诉他，那天夜里他正在外面巡视，突然听到一声剧烈的爆炸声之后，看到一架正在燃着熊熊烈火的飞机从天上掉下来。

文中的郭经理是海拉尔的一个农垦公司的经理。他1993年到蒙古把256飞机的一个发动机买回了国内。这是李人毅引自《北京晚报》大概是93—94年的报导，原报导记者是纪从周。

对同一件事的另一个版本的报导是发表在解放军报1998年7月24日上的由康松乔、邢邦明、阿勇采写的《林彪出逃座机残骸收藏始末》，文中有类似的证据：

在温都尔汗时，郭经理还找到了当年的一位目击者，这位年迈的目击者简略地回顾1971年9月13日他正在值班，忽然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他出去一看，一架起飞（可能是“火”吧？——笔者注）的飞机正往下掉。后来听说上面的人全死了，其中有个中国大官。还有一个现象可以作为256飞机着陆前就已爆炸起火的旁证：256飞机着陆时，由于草原土地松软，所以不能使用起落架着陆（那样的话起落架会插入土中，引起飞机翻滚。参见孙一先书P247），只能用机腹擦着地皮降落。由于256飞机的主油箱就在机腹处，这样的动作是很容易引起油箱爆炸的。所以“按照航空规程，飞机迫降时如要擦肚皮落地，必须在空中把油耗尽，避免着陆时起火爆炸”（孙一先书P265）。而实际上飞机在迫降的时刻还有约2.5吨油，还可以至少飞20分钟（孙一先书P277）。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驾驶员没等飞机盘旋将油耗尽就迫降了。而这个举动后来也确实引起机腹处的主油箱爆炸和一片大火。我们不禁要问：潘景寅是最优秀的驾

驶员，他不可能忘掉这一规程。而别的紧急迫降规程如：摘掉手表，脱掉鞋袜，这些细小的迫降规程机上乘员都做得很完满，为什么唯独耗尽机腹主油箱中的油料这一更重要的，决定生死的步骤却不作？

笔者认为道理很简单：正是因为飞机此前已经中弹爆炸起火，所以已经等不及再在空中飞 20 分钟耗尽油料了。只能在大火中，带着 2.5 吨油料强行迫降。

这就帮助旁证了笔者认为是“256 飞机着陆前就已爆炸起火”的观点。

从上述引文和旁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256 飞机在着陆前就已经起火”。而且是由爆炸引起。

256 飞机是先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然后在带着大火的情况下迫降的。这和前面许大使及调查组的判断：“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可以肯定，该机不是空中爆炸”差的太远了——在空中真是又爆炸又起火！

海外与国内的不同角度的报导应该能充份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256 飞机在着陆前就已经起火”，而且此前发生了爆炸。这自然引发一个问题：这着陆前的爆炸起火是怎么来的？

当然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我军导弹打的。但我方以大量分析否认了这一点。到底怎么回事？

笔者在此不妨提出推测：并不是我军发射了导弹，而可能是苏蒙方面发射了导弹将 256 飞机击中，引起爆炸并着火。下面分析一下：

大家都知道，林彪飞机临出境前，周恩来曾请示毛主席是否击落它。毛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想来周恩来与林彪并无旧仇，即使文革中关系也不错，周没有必要致林彪于死地。况且毛主席都发话了，周恩来绝不可能（也不敢）公开对抗毛的指示。他若动用导弹打 256 飞机，绝不可能瞒得过毛。（笔者非常不同意王兆军认为的“林彪事件中，是周恩来想主动致林彪于死地”的观点）。

而从现象分析来看，恐怕真如我方所说，我方“并未发射导弹”。

因为：

1、256 飞机在飞出国境之前，在我国境内上空曾经犹犹豫豫徘徊很长时间（0：32 起飞，1：50 出境。在国内绕了 1 个多小时。孙一先书 P169），只要我方决心将它打下，作为一架民航飞机，它几乎不可能逃过导弹和歼击机的打击飞出国境——可见我方是有意放走它的。

2、如果认为在 256 飞机出境前，我军就用导弹将其击中受伤。则恐怕 256 飞机不可能再在外蒙古境内飞那么长时间——这也很难解释蒙古保管员在温都尔汗听到空中 256 飞机的爆炸声。

3、如果认为是在256飞机返回中国途中，我方发射导弹，在温都尔汗附近将其击中（王兆军就是此种观点）。则由于温都尔汗距离我国边界至少350公里，恐怕中国防空导弹，大炮都没那么大射程，根本不可能击中它。

既然我方并未发射导弹，而256飞机在没有遭到外界攻击的情况下，在空中，由于自身故障造成爆炸起火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哪有那么巧的事，一叛逃就自爆？）。这样就只可能是苏蒙方面将其击中，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

其实，我们可以从苏联和蒙古的角度审视一下这种推测的可能性：

当256飞机越境进入蒙古领空后，苏蒙方面全程监视它，也能判断出它是民航客机。但开始时苏蒙方面也判断不清：它是迷航？还是来叛逃？或者故意以民航飞机身份刺探苏蒙防空系统雷达（类似八十年代大韩航空客机事件）？此时苏蒙方面还不会下命令击毁它，因为在情况还没判明时，就立刻将越境中国飞机打下。苏联岂不是一切中国叛逃的飞机都不要，一切中国迷航的民航飞机都打掉，未免太绝了吧？苏蒙方面此时只能进行密切监视，看它后面的举动。

在256飞机飞到苏蒙边境转向之前的这一段路程中，苏蒙方面是无法具体判断256飞机的目的的。只能让它继续飞，进行观察。而当256飞机在蒙古境内几乎横穿了一遍，却又突然从苏蒙边境调转机头返回，直接向中国方向目的明确地返回，并到达温都尔汗附近时，它返回中国的趋势已经明显。苏蒙方面很可能做出判断认为：既然目的明确地返回中国，这就不是叛逃，也不是迷航，而在当时中苏关系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这很可能是中方利用民航飞机刺探苏蒙防空雷达，现在目的达到了就想溜回中国。于是下令将其击落。其实苏联当时的心态和决策完全可以对比八十年代苏联在库页岛附近击落南朝鲜大韩航空客机时的情形（美军通过此行动也确实了解了很多诸如苏军防空雷达频率等情报）——而且以当时中苏关系高度紧张的态势，苏蒙方面的击落决策更具可能性。

补充说明一点：从这里也为前面我们认为的“256飞机返转不是由于缺油在寻找机场迫降”的观点提供了又一个旁证。因为，如果256飞机返回时显示出徘徊、寻觅、找机场迫降的样子，则苏蒙方面也就判断不清：它是迷航？还是来叛逃？则恐怕苏蒙方面当时还下不了决心将它击落。而恐怕正是由于256飞机返回得坚决，且返回了不短的距离，从航迹和飞行趋势上分析，也足以使得苏蒙方面认为它是想飞回中国——而不像是找机场迫降——所以苏蒙方面才下决心将它击落。——从这里也为前面我们认为的“256飞机返转不是由于缺油在寻找机场”的观点提供了旁证。

苏蒙方面几十年来对这件事进行保密，恐怕是有意不让我方了解苏蒙方面的防空效率，我方在这件事上恐怕真的是不了解情况。

现在如果认为256飞机遭到了苏蒙方面导弹的袭击，那么读者还会提出一个问题，这就是：这个结论与我方从技术上分析认为不可能是导弹击落的证据无法协调起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面笔者将给出分析：

首先，我们还是有理由怀疑我方调查组的证据本身是否准确。比如前面许大使引用的调查组认为“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的结论，在蒙古方面众多目击者的证词下，就显然是错误的结论。我们当然也有理由怀疑调查组别的结论是否可靠。特别是我方专业技术调查组无法亲临蒙古观察，只能靠我国驻蒙古大使馆人员孙一先拍摄的相片进行研究（这是空军司令王海的回忆《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讲的），难免有不准之处。

其次，我们再从纯技术角度分析一下，反驳一下调查组的部份结论：

我们先看一下调查组的结论，当时由王海牵头组织了一个专家班子，承担调查任务。以下选自王海的文章《我的战斗生涯·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

……该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我们在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失事现场，有一道相当长且清晰的轨迹，这显然是飞机在地面高速滑行时留下的；飞机的残骸散布呈带状，比较集中，根据测算，如果飞机在空中爆炸，残骸碎片抛落地面，其散布面会很广，甚至可以抛落到十几公里乃至几十公里的范围内；机上人员的尸体也散布在一小片面积内，而且形状清晰可辨，如果从高空坠落，不可能呈现此种状态；另外，飞机若是在空中起火，机上燃料很快会在空中散掉，不会像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样形成地面大面积燃烧的痕迹。其二，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可以排除。除上述根据外，大量证据显示，飞机接地时是完整的，机身上引起种种猜测的大洞，是飞机上油箱里的油同时向外燃烧爆炸时形成的。

……

王海想说的无非两点：1.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及其理由。2.飞机不是“空中起火”及其理由。以下笔者进行反驳：

1、以前的分析者总是认为“飞机空中爆炸”，就必然意味着是在空中炸个粉碎——所以就不可能在地面留下着陆滑痕；飞机残骸就不可能集中分布；尸体散布也不可能集中，就不可能是人为操纵的迫降……。其实凭什么一定这样？飞机中导弹后凭什么一定在空中炸个粉碎？为什么就不能是飞机部份受伤受损呢——为什么不考虑这种情况？

2 5 6 飞机在空中机翼中导弹后，完全可能只是部份被炸坏，也就是飞机受伤了——并未被炸得粉碎。所以它还能勉强飞行一段。我想 2 5 6 飞机就是这样。2 5 6 飞机机翼中弹后，引起大火，不过并未“粉碎”，只是不能远飞了，只能带火迫降，并在着陆过程中也不顺利，又发生了新事故——这着陆过程中的新事故的情况倒可能与调查组的分析相似了。

所以假如按照笔者的做出的结论也仍然可以满足王海举出的失事现场情况：地面有轨迹；飞机残骸集中；尸体散布集中；“飞机接地时是完整的”。

2、“飞机在空中起火”，可能仅是弹片击中位于右侧机翼部位的油箱引起。而 2 5 6 飞机在机腹也有油箱（这是主油箱）。所以也可以保证：机翼中弹，所以机翼油箱爆炸起火。迫降时，用机腹着陆，由于此前已没时间进行盘旋耗尽燃油，所以

机腹油箱破裂，燃油导致“地面大面积燃烧”。

这样一分析，王海在上文指出的失事现场的几个问题，笔者的说法也能解释得通。256飞机中弹在空中爆炸（只炸坏一部份）失火，并进行着陆失败是完全可能的。王海的分析不能否认“导弹击中说”。

另外，还有一个飞机机翼上著名的大洞问题。

我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在《黄沙作证》一文中写道：“……右机翼的内展部份，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40厘米的大洞”。又写道：“飞机右翼根部那个直径约40厘米的大洞，曾令人怀疑是防空导弹击中的。但机翼的顶面并未穿透，而且洞孔形状不规则，边缘是向外翻的，说明它是从内部爆炸冲击形成的”。（《林彪家族纪事》P8—21）

正是由于大洞处的铝刺是“向外翻的”，所以他认为大洞“是从内部爆炸冲击形成的”。是着陆时油箱爆炸引起的，这一证据想必不少读者都听说过。

但是这“外翻”的证据本身就并不一定可靠。

我国驻蒙武官孙一先对大洞的铝刺的情形描述就不同。他在自己的书P195中描述道：“……我登上去仔细观察，洞在翼根处中央，直径40厘米。周围不规则的铝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

可见对同一个洞的铝刺方向的描述，许文益说“外翻”——并把它作为不是导弹击中的重要证据。孙一先说：“有的朝里，有的朝外”。我们到底听谁的？

在肖思科参与编写的《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0年）一书P50、54中，他显然采用了孙一先的说法。既然林彪问题研究专家采用了此说法，笔者也采用之。即大洞“周围不规则的铝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

在孙一先书P260中有一段李耀文的相关分析：

256号右翼根部的洞是油箱着火向下冲炸开的，所以翼面没有穿透，洞口铝刺也不规则。如果是导弹打的，不可能不穿透机翼，而铝刺也都应该通通向里翻。

笔者不同意这段分析！一般来说，机翼内部油箱爆炸，则大洞的铝刺全部“外翻”的可能性大；若是外部导弹击中，则大洞的铝刺全部“内翻”的可能性大。现在的情况是：铝刺不规则，“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则既有可能内部油箱爆炸，也有可能导弹所致。所以单凭铝刺的状态凭什么肯定不可能是导弹击中？另外，导弹击中机翼也不一定非要穿透机翼的顶面。

对于大洞问题笔者总的观点是：不能排除大洞就是导弹击中造成的。但是，也有可能弹着点在别处，只不过未发现。因为一方面调查组全靠照片进行研究难以精确，另一方面，一些部件已被苏联人拆走，现场已被破坏。

可以这么说：从纯技术的角度，整个调查组就没有认真考虑“256飞机仅只是被导弹击伤，而不是立刻被击落或击碎”这种情况，即使在调查报告中提了一句这种情况，却根本未展开分析，否定这种可能性——而是与分析别的情况混在一起，悄悄滑了过去。（也可参见孙一先书P276—278）。

孙一先书P279中还有如下的说法：

913过后，来自蒙军和驻蒙苏军的一些内部情况表明，他们在纵深没有发现这架中国飞机，因此不可能发射地空导弹，或者起飞战斗机拦截。

苏蒙空军真是如此水平低下？连一架民航飞机的闯入也监视不了？其实，我们只要看一下前面提到的日本刊物2000年采访前蒙古副外长云登的那篇报导中的话：“当时的说法好像是蒙古完全不知情，其实是一开始便掌握了该机的飞行轨迹”。以及汉纳姆采访克格勃的话。就知道：苏蒙方面当时就完全了解256飞机的航迹。苏蒙方面只不过当时佯装防空效率低下，骗中国而已。我们怎能今天还上这个当？

所以笔者认为我方调查组从纯技术角度否定“导弹击中说”的证据靠不住。我们现在甚至可以推测一下是谁打下了256飞机：

请看《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P51（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0年）：在伊白（即孙一先——笔者注）随许大使从乌兰巴托乘飞机赶往温都尔汗时，曾在飞机上看见离现场不远有一个某国空军基地，驻有一个师的航空兵。

笔者推测可能就是这个苏军航空师的导弹将256飞机击落。而笔者研究了前面提到的日本刊物采访蒙古副外长云登的那篇报导（本文中并未引用全），笔者认为：恐怕不是蒙古军队发射的导弹。

这样我们就可以补充前面的“9月12日夜林彪出走梗概”：

- 一〉256飞机从苏蒙边境调转机头，向中国返回
- 一〉向中国方向飞行一段距离后，到达温都尔汗附近
- 一〉苏蒙方面在跟踪了256飞机的航迹后认为：此机既非迷航，也非叛逃，而是在有意利用民航飞机刺探完苏蒙方面的防空雷达后想逃回中国。于是下令向其开火
- 一〉256飞机机翼中弹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飞机仍能飞行一段，只好盘旋寻找迫降地点，并带着大火进行迫降。由于火太大，256飞机已经没有时间进行盘旋以耗尽机腹主油箱的燃油了。所以只能带着2.5吨油用机腹着陆。飞机着陆时动作有误并且机腹油箱破裂引发大火，大爆炸，导致机毁人亡。

笔者在以上较多运用分析推理的方法探讨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走事件。现在笔者发现其实还有另一条道路也可以有力地帮助我们揭开913之谜，那就是256飞机上的黑匣子。

256飞机上有无黑匣子？很多人认为没有（比如张聂尔书中P293即这样说）。现在看肯定有黑匣子。

前面提到的我国驻蒙古武官孙一先的书《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有这样的话：

据我国民航专家讲，三叉戟飞机从“1 E型”开始，已装有70年代稀有的黑匣子。它由两部份组成，一部份是飞行数据记录仪，另一部份录制机上相互通话和同地面的通话，名称是“驾驶员座舱语音记录器”，飞机一起飞他们就自动开始工作，……似乎可做出这样的判断：三叉戟256号的黑匣子，连同中间的发动机，都被苏联人拆走了。

——孙书P 190

以下是孙一先引用彼得·汉纳姆的采访：

最后，他（指彼得·汉纳姆——笔者注）问了一下这架飞机有没有黑匣子，扎格沃兹丁说黑匣子找到了，但克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

——孙书P 334

显然，256飞机中有黑匣子。虽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但驾驶舱中的其他人员的对话应该有吧？对揭开林彪登机以后的迷雾一定大有帮助。我们希望俄罗斯归还原本就属于中国的黑匣子。

最后对全文总结一下。综合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四条新的核心质疑：

一、林彪在去机场的汽车上到底说没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关键性的话？

二、林彪一行为什么没有按原计划飞往广州（香港）？是不是因为机上燃油不足？

三、关于“256飞机从苏联，蒙古边境掉头飞回中国方向”：

1.这是否是事实？

2.如果是事实，飞机为何不一直飞向苏联？为何又掉头返回中国？飞机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四、关于“256飞机着陆前曾发生爆炸并起火”：

1.这是否是事实？

2.如果是事实，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被苏蒙方面导弹击中？

~~~~~

【史海钩沉】

澳洲记者澄清林彪之死真相

• 孙一先 •

近一两年，国内兴起一阵关于林彪出逃、坠机原因和飞机残骸的报导热。究其由来，可能是“九一三”事件虽经历史判定，但还存在一些未解之谜。众多作者尤其是那些当年曾身历其境的人们，从各自角度描述亲历的过程，寻找最后的答案。本文作者系当年“九一三”事件期间我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官员。

西方世界的新闻媒体，对新中国一直存在着固执的偏见，他们散布大量怀疑论调，不相信我国作者揭露的历史真相。

林彪究竟是怎么死的，死在北京还是蒙古的草原上？对于最后澄清这个历史真相做出贡献的，是澳大利亚一位年轻记者彼德·汉纳姆。

在北京出版的《作家文摘》第80期1994年7月8日摘登了李安定写的《林彪之死真相查访记》，详细报导了彼德·汉纳姆的整个采访活动。该文称从1993年5月开始，彼德·汉纳姆用了半年的时间，锲而不舍地奔走于蒙古、俄罗斯、美国及台湾、香港地区，往返数万公里，写出了第一手调查材料，发表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杂志上。此事立即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许多国家的报刊对他的文章予以转载和评述。

汉纳姆起初是自己出钱进行这次采访旅行的。首先他来到改变了社会制度走向自由化的蒙古，自己雇车到达林彪座机坠毁现场。原来保护现场的铁丝网已被拆除，附近居民哄抢了飞机残骸，一些较大的部件，由贝尔赫矿区派人运走，卖给了中国商人。汉纳姆在现场只拣到12块飞机残片。现场附近的居民向他讲述了所见飞机坠地燃烧及尸体情况，但许多人不知道林彪是谁，更无法证实林彪在这架飞机上。

汉纳姆找到了当年参与苏联专家检验遇难者尸体工作的蒙古病理专家莫尤按：此人是中国大使及其随员视察坠机现场时，蒙方随行的卫生组法医。这个人向他描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情节：

1971年9月13日，中国喷气飞机坠毁的当天，苏联人就赶到现场。这批苏联人是由军人和航空专家组成的调查组，他们负责了解飞机坠毁的原因，但他们对九具尸体不屑一顾，而对这架英国制造的三叉戟飞机更感兴趣，把三台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制造的斯佩式发动机中尚完好的一台拆运回苏联。

苏联当局根据其驻华使馆的情报，认为应该对这架飞机上乘坐的究竟是什么人弄清楚，于是在飞机坠毁五周之后（按：后来俄罗斯报纸又称为9月下旬），派克格勃的调查组来到坠机现场。他们把墓地的棺材全部挖了出来，逐个检验因天寒地冻而未完全腐烂的尸体，在蒙古专家的帮助下，首先肯定了尸体的所有伤痕都是因飞机坠毁造成的，排除了乘客是在坠机前死亡的可能性，但烧焦的尸体已面目全非，比照资料难以判定。于是，他们割下了那个女人和那个岁数最大的男人的头颅，放在大锅里架起柴火煮，目的是将毛发、皮肉剥离干净。最后，苏联人把两个煮干净的头颅装箱带回苏联。

汉纳姆听了蒙古专家的讲述以后，认为揭开谜底必须到莫斯科去。但是，到那里找谁呢？他在乌兰巴托苦苦追索中，得到一张当时苏联调查组人员和蒙古官员聚

餐的照片，有人向他指出其中一位是来自莫斯科第三医院的托米林——调查组的主要病理学家。

汉纳姆用自己的稿费买了机票，想到莫斯科来个顺藤摸瓜，弄清真相。但在一个国际大都市中，凭一张照片、一个名字来寻找一个人，实如大海捞针。当他得知莫斯科第三医院已经撤销的时候，没有死心，拿着照片几乎找遍了莫斯科的大小病理实验室，终于有人认出了托米林，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

托米林友好地接待了汉纳姆，但他拒绝回答有关问题，强调他同克格勃有协议，不得泄露调查结果，尽管克格勃不存在了，仍然要经过克格勃的后继机构的批准，他才能把秘密公开。

汉纳姆费了很大周折，弄清了取代克格勃的新机构，递去了采访申请。当时正值盛夏，俄国官员许多都到郊外度假去了，汉纳姆一趟趟跑，也找不到要找的人。签证眼看到期，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幸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杂志知道了他的采访计划，愿意给予部份资助。于是，他利用等待莫斯科官方批准的时间，到美国去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调查。

在美国，汉纳姆访问了外交界、情报界、新闻界许多人士，收获甚微。一个华人餐馆的老板介绍并安排他同在纽约的张宁见了面。张宁向汉纳姆诉说了自己的遭遇，讲了叶群、林立果和林彪出逃的情况，她肯定林彪乘上“三叉戟256号”飞机飞走。

汉纳姆重返莫斯科，惊喜地获悉托米林得到批准向他讲明当年的事实真相。1993年10月，托米林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汉纳姆，在座的还有当年飞机坠毁事件调查组的负责人、原克格勃的将军扎格沃兹丁。“林彪和他的夫人叶群在这架飞机上，他们是因为这架飞机坠毁而丧生。”扎格沃兹丁断然地说。“你们如何证实这个结论呢？”汉纳姆问。托米林拿出一包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和资料，其中有一张从正面和左右侧面三个角度拍摄的头骨照片。托米林指着照片说“这正是林彪的头骨”，并解释说林彪的头部在战争中受过伤，其位置正好与头骨伤痕相吻合，而且苏联保有林彪1938年～1941年在莫斯科治病的详细病历，有关林彪牙科记录也与实际情况丝毫不差。

扎格沃兹丁补充说：“我们另一个鉴定方法，是用头骨对照了林彪生前的照片。克格勃的资料里有一张俯拍的免冠照片，清楚显示了林彪头的伤痕。我们还把头骨照片和林彪过去的一些照片叠放，看到两者的轮廓完全重合。”

托米林还说，人们的耳廓如同指纹，一个人一个样，没有重复的，因而是鉴定身份的重要依据。当年从现场割下了那具女尸的一只耳朵，与叶群的有关资料对照，得出了相应的结论。

为了使鉴定头骨和耳廓的结论万无一失，克格勃的这个调查组，根据林彪病历中患过肺结核的记载，重返蒙古检验尸体。托米林记得那天正好是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北风怒号，天寒地冻，他们挖出了林彪尸体，在其右肺确实发现钙化的硬块，与病历中的X光片一致。

托米林回忆说：“当时已是11月，天气寒冷，我们每过5分钟就得把手伸进温水中暖一暖。结核病灶很快便找到了。临走时，我又收集了那两具尸体的几块骨骼和所有牙齿。回国后，我对那几块骨骼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死者的身高和年龄同林彪及其妻子叶群的身高和年龄完全相符。”托米林怕万一有失，决定用拉特涅基氏液由酒精、醋酸和漂白物质组成的混合物，可以大体恢复半腐败器官的形状和大小，甚至恢复肌肉弹性来检验在飞机失事现场割下的林彪和叶群的耳朵。实验结果再次证实了前面的结论。最后，在向安德罗波夫汇报鉴定结果之前，托米林找到了能根据人的头骨构造恢复其面貌的专家，复制出林彪的头像，结果同照片分毫不差。

调查组的工作，使苏联最高领导非常满意，他们得到了嘉奖和晋升，扎格沃兹丁擢升为将军，托米林则获得领导国防部所有病理实验室的特权。

扎格沃兹丁对汉纳姆说：“22年来，全世界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个事件的结果——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当时的克格勃主席、托米林和我。今天，我们把这个调查结果透露给你。”

汉纳姆当然心满意足，他半年来艰苦的奔波采访，终于找到了一个历史悬案的谜底。最后他问了一下这架飞机有没有黑匣子，扎格沃兹丁说黑匣子找到了，但克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

汉纳姆的采访报导，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披露之后，许多国家的报刊予以登载，其影响相当广泛，使得在海外出版的某书所散布“林彪是在北京被毛泽东搞掉的，没有在那架坠毁的飞机上”的谣言及其造谣者，消弭得无声无息。

□ 摘自《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吕青（加拿大）

《CND》总编：
熊波（美国）
